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50

15 October 1980

CHINESE

第二二五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10月15日星期三下午3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成员国</u> ：	孟加拉国	胡克先生
	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奥马罗先生
	挪威	奥尔戈德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0-61589/A

下午4时10分会议开始

向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

主席：在会议开头，我要代表安理会，就阿尔及利亚因10月10日的地震所遭受的严重破坏和生命损失，向阿尔及利亚政府表示极为深切的慰问和同情。安理会成员国对这次大灾难的哀痛同阿尔及利亚人民完全一样。

向卸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这是安全理事会十月份的首次公开会议，我要代表安理会，向九月份的主席、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利姆先生致敬，感谢他在安理会必须审议特别困难的事务的九月份当中，以不懈的努力和伟大的外交技巧主持了安理会的会议活动。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

主席：按照第2247次和2248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伊拉克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日本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哈马迪先生（伊拉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西堀先生（日本）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伊朗和古巴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通常的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按照《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阿达卡尼先生（伊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罗亚·科里先生（古巴）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再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安理会成员面前有下列文件：S/14205，载有安全理事会在第479(1980)号决议第5段中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S/14203，载有1980年9月29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全文；S/14206，载有1980年10月1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给秘书长的信全文；S/14210，载有1980年10月6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全文；S/14213；载有1980年10月10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全文；S/14214，载有1980年10月12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给秘书长的信全文；及S/14216，载有1980年10月13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全文。

欢迎伊拉克外交部哈马迪先生，我请他发言。

哈马迪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容我真诚地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其他成员让我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之一，伊拉克在其国际关系中一直坚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规定。我们是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不结盟运动的各项原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柱石。我们不仅全心全意致力于这些原则，而且还在我们的国际关系中把这些原则化为行动。不管是在我们的区域或是在世界的舞台上，我们一直都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避免世界经济灾难作为我们的政策。但是这项政策绝对排斥来自任何地区的任何形式的干涉，不管其借口是什么。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任何违反合法建立的国家行为规范而想干涉我们国家内政的企图或行动。

说到这里，请容我讲明，安理会现在所要处理的这个问题应当用正确的观点去看。要不然我们就会忽略掉问题的重要方面，也因而得不出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既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那么单纯。问题可以追溯到460年前的历史。它不仅只是边界的问题或仅只是航行权方面的小冲突。问题比这要广得多。

(伊拉克)

历史告诉我们，从1520年以来，“波斯国”同它的西方邻国缔结了18项关系条约，包括边界问题条约，结果这个国家却以口头或行动终止了这些条约。我们是伊朗的邻居，同伊朗人民有文化、宗教和人文的联系。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事实使我们深信伊朗连续几个政权奉行的政策和行动明显是领土扩张主义的政策和行动。我不会要安理会听我算历史的细帐。我只须回顾一下最近一件历史事实。我们都见过了伊朗国王的权力和统治幻想，这种幻想并不局限在阿拉伯湾，而是延伸到印度洋和印度洋以外的地方去。而今天我们大家也都晓得伊朗巴尼·萨德尔总统宣布过穆斯林国家之间没有疆界。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家之间应建立自由公开的关系的一种政策，因为伊朗政府声称许多伊斯兰国家，象巴林、也门和阿曼等国，甚至我国首都都是伊朗的属地。

伊朗政府及其代表们声称，自从伊斯兰共和国在伊朗建立以后，我国政府就对新政权采取了一种敌对的态度。这项指控完全是没有根据的。霍梅尼在伊拉克避难过15年左右，得到伊拉克的全面道义和物质支持达七年以上。伊拉克在各种意义上从头就欢迎新政权的成立。

1979年4月5日，伊拉克共和国总统在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打了一封祝贺电报给霍梅尼。我国总统在电报中代表伊拉克人民和政府，并代表他个人，“最诚挚地祝贺”霍梅尼和

“友好睦邻的伊朗人民，希望新的共和国政权能够打开更多的机会，促进伊朗在致力世界和平与正义方面的作用，并巩固伊朗同阿拉伯国家总体，尤其是同伊拉克的最坚强友好关系，以服务友好的伊朗人民。”

我们收到了霍梅尼对这封电报两个答复，好的答复是透过外交部转来的，但另一个答复则于1979年4月19日至21日期间由波斯通讯社和一些报纸发表，以敌对的口气和不当的言词表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因此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就此事要求伊朗作出澄清。巴扎尔甘总理和亚兹迪外交部长告诉我们，头一封电报是正式的答复，对于第二种说词为什么出现，将进行调查。虽然调查结果并没有告

(伊拉克)

诉我们，而后来我们也没有在伊朗报纸上看到任何官方的更正，但我们还是认为事情已经了结。

尽管有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还是继续进行我们的正式接触。我国政府向巴扎尔甘政府致送了一份照会，其中表示伊拉克迫切希望同相邻的人民和国家，尤其是同伊朗，在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和按照各国人民依自由意志选择的原则尊重他们的合法愿望的基础上，建立最密切的兄弟联系与合作关系。照会中还表示这样的意见：伊拉克对伊拉克人民同伊朗和土耳其两邻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有特别的看法，因为这两国人民不仅是我们的邻人，也是我们的兄弟，阿拉伯国家总体，尤其是伊拉克人民，透过伊斯兰的联系和几百年来的共同历史而同他们产生关系。此外，伊拉克人民多年来曾经进行过反对殖民统治、腐败王朝和剥削的斗争，最后通过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的1968年7月17日革命取得了胜利。因此伊拉克人民极为同情和支持友好睦邻的伊朗人民争取自由、正义和进步的斗争。当伊朗人民在这些方面取得胜利的时候，它为之感到高兴和骄傲。在照会中，它以同样的语气对巴扎尔甘总理的声明和立场表示满意——这些声明和立场强调了伊朗一些民意趋势的伊斯兰特性——，因为这正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带原则性的实际立场。伊拉克认为这种趋势是我们区域一个重要的正面性转变，有助于促进我们区域的独立和发展。最后，照会继续表示伊拉克真诚地希望友好睦邻的伊朗人民繁荣昌盛，并真诚地希望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发展出坚强的富于成效的合作关系，以促进共同的团结，为两国共同的利益效力和加强我们区域的自由、和平与安定。

之后，我国政府曾邀请巴扎尔甘总理访问伊拉克，讨论双边的关系与互相合作的基础。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在斋月——1979年7月和8月——的时候趁这个宗教节日的机会用电报再度发出了同样的邀请。我应当指出以供列入记录的是，巴扎尔甘先生也非常合作，并试图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伊拉克)

即使是在我们同伊朗的关系出现紧张以后，伊拉克共和国总统在去年于哈瓦那同亚兹迪先生两次会见时，也明确表示了他愿意同最高阶层的伊朗领导人会见，以和平地解决我们之间的歧异。去年我在联合国这里会见了亚兹迪部长时向他重申了同一事情，亚兹迪部长说他们会在德黑兰考虑此事——但什么结果都没有。

现在我们要问一问：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什么？——无论用什么标准，都肯定是不能把这些努力看成是带有敌意的行为。

巴扎尔甘总理辞职了，亚兹迪外交部长也跟着下台。剩下来的就看霍梅尼和他的追随者们如何处理了。当时，霍梅尼已到了暴露他的伊斯兰革命的真正意图的地步，决定将他的革命输出到伊拉克和阿拉伯湾区域。在他的主持和祝福下，反动的宗派主义政党达阿瓦党——意思是“号召党”——的领袖们在库姆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作出了一项决定，想利用所谓的伊玛目战士——即伊玛目的士兵们，达阿瓦党的好战分子——通过颠覆、破坏和恐怖主义的手段推翻我们的政府。他们的设想是，当伊拉克遭到一片恐怖而政府开始不稳之后，民众的暴动会使它跨台。霍梅尼很明显地认为，他在伊朗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在伊拉克实现。

伊朗人渗透者和伊拉克的伊朗人居民以及第一代的伊朗裔伊拉克人执行了所谓的伊玛目战士——伊玛目的士兵们的任务。我们在全国境内，尤其是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目击了规模越来越大的颠覆和恐怖主义行动。巴格达的塔拉和卡都梅因，以及克巴拉、纳杰夫、阿马拉、巴士拉和纳塞利亚等城市都发生了这类的行动。其中包括在宗教和国家庆典的场合向群众投掷爆炸物、向清真寺内参加祷告的人脸部洒硝酸和在为克巴拉、纳杰夫和卡都梅因等地圣庙的朝圣者准备的食物与用水中下毒。在巴格达的塔拉——一个人口密集的工人区——，恐怖主义者的攻击夺去了许多生命，不少伊朗人恐怖主义者被抓到。伊朗大使多艾先生其后同我个人见了面，请求释放这些恐怖主义者，而我们也作了正面的反应。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从库姆直接指挥的，每天的命令都通过霍梅尼设在德黑兰、

(伊拉克)

希林堡、阿赫瓦兹、阿巴丹和库尔德斯坦的广播电台向达阿瓦的特务们发出。这些电台也发布在当地制造炸弹的指示，以用于杀害无辜的平民。伊拉克的安全人员在所述犯罪集团的藏身处俘获了相当数量的金钱、武器、炸弹、毒物和爆炸物。

其中最残忍的恐怖主义行动是1980年4月1日特务们向巴格达穆斯坦叙里亚大学的一个学生大集会场合投掷了炸弹，企图刺杀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和副总理塔里克·阿吉兹先生。在这次恐怖主义行动中有多人死亡，许多人受了伤。同样的，他们也在1980年4月5日从瓦兹里亚街的一所伊朗学校向有一些伊朗外交人员参加的追悼前次事件中被谋杀的无辜人员的送葬行列，投掷了炸弹。此外，1980年4月12日他们企图在文化和新闻部前杀害文化和新闻部长。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我们抓到了一些我较早时提到的伊玛目战士身分的那一类伊朗人。

我们以驱逐我国境内的伊朗居民出境，作为我们对这些恐怖主义行动的反应。我们的行动是基于内部安全的理由，你不能期望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会宽恕该国境内居住的外国人破坏其内部安全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正好同我刚才提到的行为相平行，目前得到伊朗庇护和支持的巴拉扎尼追随者们也开始在我国北部犯下了类似的恐怖主义行为。此外，霍梅尼当局已开始阻止伊拉克库尔德人从伊朗返回伊拉克，如果有哪些家庭的一些成员成功地返回到伊拉克，他们就向这些家庭剩下的人进行迫害。伴随着所有这些行动而来的是一场可怕的大众传播宣传运动，其狂热而偏执的宗教语气，是没有先例的。事实上，见证到这些行为的国家并不只伊拉克一个。类似的行动也企图在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

霍梅尼透过所谓的伊斯兰革命进行的计划，是想以引起宗派主义的宗教冲突造成我们区域的动荡不安。我们在伊拉克的人是排斥这种中世纪的意识。我们的概念是非宗教的概念，我们不会把国家事务同宗教混在一起。革命不能从外头

(伊拉克)

强加于人民的自由意志之上。我们决心维护我们的安全、福利和独立，起而反对霍梅尼的理论和实践。

霍梅尼当局指控我们在伊朗煽动少数民族间的国内冲突。霍梅尼当局没有看到是伊朗的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俾路支人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对打倒伊朗国王的民族斗争作出了贡献。很自然的，这些少数民族会期望所谓的伊斯兰革命能够给予它们民族的权利。伊拉克同它的重新展开的争取实现民族愿望的斗争丝毫扯不上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牵扯上去？如果不是霍梅尼当局对我们的内政进行了最危险形式的干涉我们怎么可能会对伊朗或伊朗人民，或对霍梅尼存有内在的敌意。

伊拉克在1969年7月11日的S/9323号文件中，向安理会提出了截至1969年为止伊拉克—伊朗边界法定现状的一些历史事实和详情。这项文件将予以更新和提交安理会，以说明领土扩张政策是连续的几个伊朗政府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一直都遵循着同一型式：首先是伊朗的一项辩解；接着是否定法律义务，而后设计新的法律文件，以为伊朗取得领土利益；再接着是重复同样的连续手法。

1975年3月6日的《阿尔及尔协议》并没有脱离这一型式。在此之前我们区域的政治局势显示出伊朗国王已露头想当我们区域的警察。我们以坚决维护主权、充分独立和内政不受干涉的立场，对抗了伊朗国王的扩张主义计划和主张。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和实际上都容不进这套设想内，因此他们采用了反动的巴拉扎尼造反方式作为解决手段。

他们想破坏我们国家的团结，以击败我们的抵抗。伊朗国王提供了大量尖端武器给巴拉扎尼。伊朗军队给叛乱者提供了重要的后勤支援。以色列方面从1965年至1975年装备和训练了巴拉扎尼之下的库尔德叛军，也向他们提供了指导人员。1980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件事。该报发表

(伊拉克)

了一篇报道，说梅纳希姆·贝京在所提到的这一天透露了一项该报所称的“严禁的秘密”。这篇报道指出，以色列的援助从艾希科尔开始，在果达·梅厄和拉宾时期继续增加，最后一名以色列指导人员是在1975年巴拉扎尼撤退时离开伊拉克。就在我们的人民英勇地同叛徒战斗的时候，军事局势的平衡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即1973年10月的战争。为了创造使我们能够同我们的阿拉伯兄弟一起参加这场战争的合适条件，我国政府决定通过和平手段设法同伊朗取得政治解决办法。因此当阿尔及利亚已故的总统胡阿里·布迈丁表示愿意调解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他的调解。

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双方谈判了《阿尔及尔协议》并以一揽子交易方式缔结了这项《协议》。它具有政治和法律两个方面的内涵。《协议》的精神是，双方决定“以至诚”缔结《协议》，以达成“最后和永久解决两国间一切现存问题的方法”，并认为议定的各种安排是“适用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和内政不受干涉等原则”的结果。一揽子交易的要素有：根据两国间的合法协定明确划定陆上疆界；沿河谷底线在阿拉伯河划定水上疆界；恢复共同边界沿线的安全与互信，并保证严格而有效地管制这些边界地区，以结束所有的渗透性和颠覆性行为，不论这些行为来自何方。双方所承担并且显示了《协议》的一揽子交易性质的最基本义务是其中的第4款，在该款中双方认为刚才提及的三个要素是“一套全面解决办法的组成要素，损及这些要素的任何组成部分，自然是与《协议》的精神相违”。

为了使这些安排成为更具体的手段，双方成立了一个伊拉克—伊朗部长级联合委员会，阿尔及利亚也加入了这个委员会，并于1975年6月13日在巴格达签定了《国际边界和善邻条约》及三项议定书和附件。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边界和善邻条约》第4条明确地肯定了《阿尔及尔协议》的一揽子交易性质。

在边界条约开始生效后，伊朗即取得了阿拉伯河一半以上的主权，因此很早便占有有利地位。但伊拉克却没能收回伊朗违反其国际义务而侵占的陆上土地，以

(伊拉克)

作为回报。这是伊朗国王倒台时的情形。新政权在德黑兰成立时，伊拉克政府认为在迫使新政府完成归还伊拉克属地的过程之前，让它有段宽限期还是比较合适。

但是尽管伊拉克对伊朗的变动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德黑兰的新统治者却通过他们的官方宣言和新闻传播工具很快地显露了他们对伊拉克的敌意。他们开始表现出伊朗再度有意实现领土野心和侵略扩张主义。

我要在此引述伊朗高级官员针对伊拉克和阿拉伯国家所作一大堆发言中的几个发言例子。

1980年3月21日，霍梅尼的儿子在代表他父亲作出的发言中宣称：

“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我们的革命，并拒绝接受把革命限制在我们自己国境内部的想法”。

1980年4月3日，伊朗当时的外交部长戈特布扎代宣称，亚丁和巴格达都属于伊拉克；4月9日他又进一步说伊朗政府已决定推翻伊拉克政府。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在1980年3月24日第151期的《Al-Nahar Al-Arabi Wal Dawli》对他所作的访问中说，伊朗不会从它在1971年以武力占领的三个阿拉伯岛屿撤出，也不会将它们交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并不是独立的国家。

(伊拉克)

1980年4月19日的《Jumhuri Islami》引述霍梅尼的话说，“伊拉克人民应从敌人的魔爪下自求解放；伊拉克人民和军队有义务起而反对伊拉克的这个非伊斯兰党”。戈特布扎代在4月30日蒙特卡洛电台对他的访问中否认了阿拉伯人有权索回阿拉伯湾的阿布穆萨和大、小通布等三个岛屿，据他说是因为阿拉伯湾周围的国家在历史上是伊朗领土的一部分。5月1日《Al Khaleej》报对戈特布扎代的访问中问到他说，他是不是不认为霍梅尼的讲话——即如果伊拉克继续其政策，他，霍梅尼，将前往巴格达解放伊拉克人民——构成对伊拉克内政的干涉。戈特布扎代回答说：

“不能把这点认为是对伊拉克内政的干涉，因为我们把伊斯兰国家看成一个整体，伊玛姆〔霍梅尼〕是一个宗教领袖；因此他是伊拉克人民和所有伊斯兰人民的领袖；就象他认为对伊朗负有责任一样，他也认为对伊拉克负有责任。”

此外，伊朗现在的政府还另外严重违反了《阿尔及尔协议》。这个《协议》责成伊朗回复它同伊拉克的共同边界的安全和信任，并进行严格有效的控制，以结束所有的渗透性和颠覆性行动，但伊朗政府还是公开违反了这项基本的义务。它把从前反叛伊拉克的叛乱分子残余，即巴拉扎尼的儿子及其追随者搞到伊朗去，并提供庇护。

在伊朗统治当局的明确支持下，这些集团利用伊朗领土作为威胁和袭扰伊拉克内部安全与国家完整的基地。伊拉克虽然再三要求归还伊拉克土地，不仅没有什么结果，而且还遭对方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就象我刚才所指出的。

伊拉克不同于宗教领袖霍梅尼，我们对这个国际组织还是有信心。事实上，伊拉克曾两次在安理会之前对伊朗提出控诉。第一次是在1971年当伊朗以武力占领阿拉伯湾的三个阿拉伯战略岛屿的时候，这次的控诉是以哈伊马角酋长国的名义提出的。但我们要沉痛地指出，由于安全理事会未能使伊朗从所占领的岛屿撤出，使得伊朗国王及其后继者得到了鼓励，继续追求他们在整个阿拉伯湾建立波斯霸权的美梦。

(伊拉克)

伊拉克的第二次控诉是在1974年当伊朗就象这次引起冲突那样越界侵略以后，向安理会提出的。联合国的调停还是没能阻止伊朗扩张主义者的野心，而且就象我刚才所说的，伊朗又公开地在伊拉克北部进行军事干预。

造成目前冲突的前因并不限于我到现在为止所提到的那些。从1979年2月23日到1980年5月28日，伊朗空军的飞机侵犯伊拉克领空不下57次之多。从1979年8月26日到1980年6月3日，除了伊朗大炮一再炮击伊拉克领土和边界派出所外，伊朗还进行了15次以上密集轰炸。大部分的轰炸都来自伊朗占领的伊拉克土地，即扎因考斯、赛福萨阿德和迈马克。航行在阿拉伯河上的伊拉克船只和外国船只常受到伊朗的攻击。我们就所有这些事件和侵犯行动向伊朗外交部和驻巴格达的伊朗大使馆提出了多次正式照会，但都没有得到伊朗的答复。

伊朗的官方圈子宣称，伊朗认为它不再受《阿尔及尔协议》的约束。1979年6月19日，伊朗内政部政治助理萨迪克·塔布塔拜先生说，伊朗并未执行《阿尔及尔协议》。在1980年9月15日伊朗电视网广播的一项声明中，伊朗陆军副总参谋长法拉希将军说，伊朗不承认《阿尔及尔协议》，扎因考斯和赛福萨阿德等地就象阿拉伯河一样，是伊朗的土地。最近的一次声明是巴尼·萨德尔总统本人的声明。1980年9月17日德黑兰电台报道说，他向法新社说了以下的话：

“在政治层面上，伊朗并未履行1975年同伊拉克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伊朗国王政权本身并未履行过这项协议。”

我们透过外交和政治渠道劝告伊朗履行义务的持续努力，最后都落空了。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好重申我们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收回了我们的土地。我国政府根据伊朗政府以言行明白表示要终止1975年3月6日《阿尔及尔协议》的意图，决定将该《协议》视为终止，其根据是我较早时提到的《协议》第4款的规定。

(伊拉克)

在宣布这项决定时，我们大力强调我们在伊朗没有领土野心。此外，我们公开宣布我们绝对不想同伊朗交战或把冲突范围扩大到保卫我们主权和合法权利的界限之外。

伊朗政府对这一合法立场的反应是通过不分青红皂白的敌对行为把局势升级到全面的战争，包括向阿拉伯河的伊拉克船只和外国船只动武。伊朗开始向我国境内的平民中心和经济设施进行轰炸。我国政府别无选择，只好向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直接的预防性攻击。借用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这是“必要的自卫，时间紧迫而情况迫人，不容你选择采取什么方法，也没有时间让你考虑”（《卡罗琳号》，1837年）。在采取这些行动时，我国政府明白公开地宣告，除非伊朗继续攻击伊拉克境内的平民目标，伊拉克不会对伊朗的这类目标进行军事攻击。因此，我们的行动“并无不合理或过分之处，因为出于自卫必要的行动，必须局限于自卫必要的范围内，并明确地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同上》）。

伊拉克并不主张战争，它也不相信应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正如过去的记录所证明的，伊拉克，尤其是在它同伊朗的边界关系中，一直都严格而光荣地在字面和精神实质上遵守它的国际承诺。但同时我们也不会接受外人对其主权和尊严的任何威胁或侵略方式，我们愿意为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和重要利益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

人们对最近的事件给世界经济利益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表示关切。让我再次指出，伊拉克极想尽其所能保护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任何想要扩大我们同伊朗之间问题的性质和范畴的企图，将会危及整个局势。这种态度会引来外国对我们这个地区的进一步干预，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及世界经济的繁荣，我们迫切希望把我们这个地区置于大国的势力范围 and 对抗之外。

如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整体所熟知的，伊拉克对向它提出的各种呼吁作了有利而积极的反应，并已作出努力以停止战斗和朝和平解决现有冲突的方向去推动。我

(伊拉克)

们从开始就同安全理事会合作，并参加了它的讨论。我们对安理会1980年9月28日第479(1980)号决议的反应是即时而积极的；我国总统在1980年9月29日告诉秘书长说：

“……我们自然接受上述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并宣布我们愿意遵守决议的规定，如果伊朗一方同样做的话。”(S/14203, 附件)

并说：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促使伊朗一方遵守该项决议的规定。”(同上)

伊朗正式拒绝了安理会的呼吁。此外，我们就巴基斯坦总统和伊斯兰会议秘书长的友好访问，表示愿意从10月5日至8日单边停火，这个停火实际上从10月5日拂晓开始生效。伊朗的反应是在陆、海、空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

我最后要向安理会重申，伊拉克并不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动用武力。我们坚决相信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我们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有的能量和资源用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坐视任何侵犯我国领土整体的合法主权权利或侵犯我们的安全、和平与福祉的行动。

主席：我现在请伊朗代表发言。

阿达卡尼先生(伊朗)：我不须再强调我们对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的重视。实际上，我国总理鉴于安理会面前的事项的重要性及这个事项对联合国的意义，已决定亲自到此解释我们的立场和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是他在星期四之前到不了纽约。

因此，主席先生，我请你在这个星期五安排一次会议，让他能就议程上的这个事项说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立场。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罗亚·科里先生（古巴）：主席同志，首先，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看到您将主持安全理事会十月份的会议。您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您在原则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但更重要的是，您是列宁的故乡——苏联的代表，而苏联在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建立一个没有非正义、没有剥削和没有贫穷的世界方面，是有光荣历史的。上述情况使我们肯定，您将成功地主持现在的会议并将帮助二个兄弟般的不结盟国家和平解决他们之间不幸发生的冲突。这是大家都热烈希望的事。

我国代表团还愿借此机会，对您的前任——突尼斯常驻代表在九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表示感激。

感谢您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给了我这一发言的机会。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出现的形势，引起了所有不结盟国家、全体第三世界以及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国家的极大关注。为此，我国政府指示我以不结盟运动代理主席代表的身份参加审议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不结盟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以及用和平方式解决世界任何地方出现的可能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特别是涉及不结盟国家的冲突。

对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出现的武装冲突我们深表遗憾。多少年来，古巴政府和人民与伊拉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和合作关系。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最高会议期间，我国政府同其他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一起，对伊朗人民推翻国王压迫所取得的胜利，表示敬意，并欢迎伊朗作为正式成员国加入我们的运动。

因此，我们对两国人民的感情是建立在兄弟般的友谊以及不结盟政策的原则和目标的基础之上的。

(古巴)

几周前，当冲突刚刚爆发时，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以不结盟运动关于和平解决其成员国之间冲突的决定为指导，行使他作为不结盟运动主席的权力，决定派古巴的外交部长伊西多罗·马尔米耶卡同志到巴格达和德黑兰，分别带给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和阿布哈桑·巴尼桑德尔总统他个人的亲笔信，并主动提出，古巴愿意在解决两国政府之间（两国都是古巴的朋友）不幸出现的争端中，给予真挚的合作。

马尔米耶卡部长分别在两国的首都举行了最高级会谈并转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的亲笔信。为了和平及停止军事行动，他现在再次到那个地区继续进行努力。

我可以公开讲，象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政府一样，我国政府对事态的发展深感不安。它不但对两国造成了相当大的物质破坏和不可弥补的生命损失，而且对世界上那个敏感和重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造成了严重威胁。

古巴政府将不遗余力地为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和平及体面地解决这一冲突作出贡献。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我们的外交部长，正在同伊拉克和伊朗的领导人进行第二轮会谈。他将为取得这种结果而继续努力。

我相信，我们不结盟运动的同事们有同样的心情，即国际社会现在必须为早日和平及相互满意地解决这一冲突而努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防止可能或者会使冲突扩大的军事行动的升级；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必须避免采取可能导致恶化目前微妙局势的任何行动。

总之，我国代表团希望，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头等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将为快速结束这一冲突作出积极的贡献。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及各个组织和政府已经作出的努力。作为不结盟运动主席的代表，我愿庄严重申我国政府的希望，即同不结盟运动其他成员国政府一起，促进伊朗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和平，恢复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所有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利益和团结。

(古巴)

主席：感谢古巴代表对我和我国讲的友好的话。

本次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10月17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

下午5时15分散会